

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小说家类考

张 玄

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作为第一次成书进呈的《总目》全稿,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从这部残稿小说家类来看,上图稿本继承了此前《总目》的纂修成果,而在之后《总目》小说家类的修订中,并未进行大幅度的删改。通过比较分析可知上图稿本在《总目》的纂修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承启作用。此外,上图稿本中保存了四库纂修官的修订意见,通过纂修官对提要内容、分类、排序等诸多方面的修订,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以及四库小说观念、分类的生成史。

关键词:上图稿本 《四库全书总目》 修订稿 小说家类

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二十多年的纂修过程中,纂修官对其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形成了诸多《总目》稿本。在这些稿本中,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后简称“上图稿本”)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上图稿本进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稍后四库纂修官又在此稿本上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工作,这些修订对《总目》后来的纂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上图稿本及其修订意见在整个《总目》纂修过程中具有明显承上启下的作用。现存的《总目》稿本大都已整理出版,并得到学者们深入的研究。笔者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上图稿本小说家类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和修订中所反映的小说观念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上图稿本小说家类基本情况

最早对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进行研究的是沈津先生,沈先生在《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一文中介绍了此稿本的版本情况,但并不全面,故本文稍作增补。上海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残稿,现存二十四册,金镶玉装。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所用纸大都为黄色格纸,少数用红格纸。版框高21.7厘米,宽15.5厘米。其中小说家类存:卷一百四十,小说家类一中的《世说新语》《朝野金载》两篇,页码为二、三;卷一百四十一,小说家类二,四十四篇,末附重写《侯鯖录》《泊宅编》两篇,此卷页码相连,保存较为完整,页码为一至四十九;卷一百四十二,小说家三中的《博物志》(残)《西京杂记》《述异记》《酉阳杂俎》《云仙杂记》《清异录》(残)六篇,页码为四十四至五十。

关于上图稿本抄写及修订时间,沈津先生并没有明确交代,只是说“此残稿非最初的稿本,也非后来的定稿,而是不断修改中的一部分稿本。”^①后来崔富章先生根据五种尹会一的著作提要将此稿本的抄写时间确定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又据周亮工《闽小纪》提要将修订的下限定在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前^②。而刘浦江先生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认为“上图稿本的修订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间”^③。笔者认为,刘浦江先生的结论是较为可信的。事实上,我们通过上图稿本与乾隆六十年先后刊刻的浙江杭州刻本、武英殿刻本《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浙本、殿本《总目》”)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让这一结论变得更为精确。上图稿本小说家类二中的《墨客挥犀》提要,书名下附注版本来源为“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浙本《总目》则注为“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我们知道纪昀在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任内阁学士,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调补兵部侍郎,内阁学士员缺,着李绶补授”^④,而在上图稿本“小说家类”二中《墨客挥犀》《随隐漫录》《山房随笔》均注为“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且均未加修订。由此可以说明,上图稿本的修订时间的下限应该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以前。如果四月以后仍在修订的话,那么此时纪昀已经调补为兵部侍郎,其头衔也应该加以修订。另外,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也能为此结论提供相关佐证。据刘浦江先生考证,“天图稿本的抄写时间上限大致划定在乾隆四十八、四十九年,其下限最迟不会晚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⑤。天图残稿中有周亮工《书影》提要,其标题下所注版本来源,已改为“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而天图稿本是直接根据上图稿本修订稿抄写而成的,上图稿本于此书未改,而一年之后抄写成的天图稿本加以改正,这说明上图稿本的修订并无遗漏的可能,其修订时间应该也不会晚于乾

①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37页。

②崔富章:《版本目录论丛》,中华书局,2014年,第15-16页。

③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第6页。

④贺治起、吴庆荣:《纪晓岚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1-90页。

⑤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期,第175页。

隆四十七年四月。或许是由于校勘的疏忽,最先刊刻的殿本《墨客挥犀》提要仍作“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而《随隐漫录》《山房随笔》已改为“兵部侍郎”。

将上图稿本与浙本、殿本《总目》相比勘,笔者发现他们之间还有以下几点不同的地方^①:

(一)所收篇目和篇数不同。上图稿本卷一百四十一小说家类二卷末云:“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八十五部,五百六十一卷,内一部无卷数皆文渊阁著录。”^②而殿本《总目》则云:“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皆文渊阁著录。”^③浙本较殿本多出一卷,为五百八十一卷。上图稿本的小说家类二共收录提要四十四篇(除去重复的《侯鯖录》《泊宅编》两篇),浙本、殿本《总目》收录四十二篇。从具体所收篇目来看,上图稿本中的《春渚纪闻》《中吴纪闻》为殿本《总目》所无,浙本《总目》于两篇之外又少《东轩笔录》一篇,而浙本、殿本《总目》中的《程史》《乐郊私语》为上图稿本所无。

(二)提要分类不同。在浙本、殿本《总目》中《东轩笔录》著录在小说家类中,《春渚纪闻》著录在杂家类五,《中吴纪闻》则著录在史部地理类。其中,《中吴纪闻》一篇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中,曾多次徘徊于史部地理类和子部小说家类之间,可见纂修官在此篇的分类上颇费一番心思。后文将有详细论述,此不赘。

(三)篇目顺序上的差异。上图稿本与浙本、殿本《总目》在篇目顺序的排列上差异较大,我们还可以看到,上图稿本中,纂修官对篇目顺序进行了修订。而这一修订与乾隆四十六年进呈之后,清高宗所发两道谕旨中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这次修订,笔者也拟在下文进行详细论述。

(四)卷数不同。小说家类二中的《鸡肋编》,标题下注“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而浙本、殿本《总目》均注明此书“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查阅《四库采进书目》,此书著录在《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中,并注明一卷,一本^④。

二、上图稿本小说家类所作的修订

上图稿本小说家类的修订方式与其他部类基本相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要的增、删。纂修官在稿本中删除提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书眉处朱笔写上“删”、“此篇删”等字样,如《西京杂记》和《云仙杂记》的书眉处

①因小说家类二保存完整,故本文基本以此卷作为比勘的范围。

②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叶四十九A。

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90页。

④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原名《各省进呈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67页。

分别写有“此篇删”、“删”字样。另外一种是直接以「」符号,表示将此篇删去^①,如《春渚纪闻》《中吴纪闻》《吴中旧事》。而增补提要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在书眉处直接写明所增加的提要。在《步里客谈》书眉处,写有“此下补《程史》一篇二十六”。《遂昌杂录》的书眉处写有“添《乐郊私语》一篇三十”。另一种是用另一张纸写就,夹(或粘)在书中,以示增补。如《东南纪闻》,提要未注明“补《随隐漫录》下”。而在《随隐漫录》提要的书眉处也注明“此下补《东南纪闻》一篇三十一”。

(二)提要的分类。小说在内容上往往非常混杂,有时会给著录者带来很大的麻烦,这种困惑也同样出现在《总目》小说家类的著录上。或许是因为纂修官们意见的不统一,导致对一篇提要的分类进行了多次的修订。比较典型的是《吴中旧事》,最早提及此书分类问题的是于敏中,《于文襄手札》收录了其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四十一年间所写信札。其中,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三日一封信中写道:“此次取到之书,昨已发下,《汉秘葬经》《吴中旧事》《金碧故事》三种并论,皆非要书,毋庸刊刻,则《吴中旧事》亦可无须再行缮进,即在应抄之列,亦止须缓办。再检阅此书所载,并非前贤嘉言懿行,不过诗话说部之类,似不应附于史部,应请再酌。”^②稍后,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九信中又提及此事:“接字悉种种,《吴中旧事》改入子部小说家极为妥合。”^③从这两封信中可知,于敏中的建议得到了纂修官的响应,此书被改入小说家类。此时《总目》尚在分纂阶段,而不久之后,大概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汇纂而成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进呈存目》”)却没有收录此书^④。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上图稿本则将此书著录在小说家类二,但上图稿本修订稿又将此篇删去,放入史部地理类,之后的国家图书馆藏《总目》稿本也作了同样的处理。虽然我们无法了解天津图书馆所藏稿本《总目》小说家类的修订情况^⑤,但从现存《总目》稿本的源流关系中可以判断,其在著录方面应该与上图稿本是相同的。而乾隆六十年先后刊刻的浙本、殿本《总目》,最终也将此书定格在了史部地理类。从此篇提要的修订过程可见纂修官们在小说著录上的分歧和矛盾。

①纂修官所使用的这一符号,与直接写明删除略有不同。其具体含义为:将此篇提要从此类中(或此卷)删去,调到其他部类。

②于敏中:《于文襄手札》(一),《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四叶A。该书影印稿本,无页码,本文按原书顺序编码。

③于敏中:《于文襄手札》(一),第五叶A。

④参见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中华文史论丛》第115期,2014年,第295页。

⑤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中的小说家类散佚。

(三)提要内容的修改。纂修官对提要内容的修订,大都是在原稿上直接进行的。有一些是直接划线删去部分内容,有的是在需要修订的内容上划线,将修改文字写于其旁。这些修订有的是对抄写错误的改正,有的是对内容考证的修改,也有对行文语意的润色,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有违碍文字,故而删改。以《辍耕录》为例,浙本、殿本《总目》遵从上图稿本修订本的面貌,删去了上图稿本文末的一段话:“惟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餘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宗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后乃平陈,未闻唐宗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漏。后维桢编《东维子集》,不载此文,盖已自悟其缪而削之。宗仪乃掇拾缕载,尤为寡识。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这种改动的背后隐藏着一番政治考量。清政府对涉及辽、金、元三朝的文字是相当敏感的,乾隆四十三年《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即有:“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纪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尤甚者,乃行签出拟销。”^②后清高宗在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发谕旨:“前因披阅《御批通鉴纲目续编》,内《发明》《广义》各条,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之处,特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改补,黏签呈览,并遇便发交直省督抚各一部,令其照本抽改。”^③可见清高宗对此事忌讳之深,查处之严厉。正因为此,纂修官在最初拟稿时才对杨维桢的《正统论辨》大加斥责。在上图稿本的修订中,纂修官删去了末尾涉及杨维桢《正统论》的一段文字,其直接原因是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所下发的《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论辨〉谕》,其中明确说道:“今馆臣编辑《四库全书》,谓其持论纰缪,并《辍耕录》内所载者亦与删除,且言‘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此语似是而非。”^④可见清高宗并不同意馆臣的观点,而背后的原因,仔细阅读这道谕旨之后便一目了然。清高宗认为借杨文正好可以说明清朝“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的正统地位,而辽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3页。浙本、殿本提要内容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本文举浙本为例。

②陈垣、王重民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第六十页B。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寄谕各省督抚务须实力妥办更正〈通鉴纲目续编〉仍于年终汇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17页。

④永瑆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01册,第332页。

金乃是无所承继,自然也不能和清朝相比^①。

四、提要篇目顺序的排列。上图稿本《总目》每篇提要的书眉处均有朱笔所写的数字,从这些数字来看,应该是纂修官对提要的重新排序。为了更为清晰的展示这部分内容,笔者将上图稿本、上图稿本修订稿及浙本、殿本《总目》小说家类二的提要顺序列表如下:

序号	上图稿本	上图稿本修订稿	浙本《总目》	殿本《总目》
1	《铁围山丛谈》	《东轩笔录》	《侯鯖录》	《东轩笔录》
2	《春渚纪闻》	《侯鯖录》	《泊宅编》	《泊宅编》
3	《国老谈苑》	《泊宅编》	《珍席放谈》	《珍席放谈》
4	《道山清话》	《珍席放谈》	《铁围山丛谈》	《铁围山丛谈》
5	《墨客挥犀》	《铁围山丛谈》	《国老谈苑》	《国老谈苑》
6	《唐语林》	《国老谈苑》	《道山清话》	《道山清话》
7	《枫窗小牍》	《道山清话》	《墨客挥犀》	《墨客挥犀》
8	《侯鯖录》	《墨客挥犀》	《唐语林》	《唐语林》
9	《东轩笔录》	《唐语林》	《枫窗小牍》	《枫窗小牍》
10	《萍州可谈》	《枫窗小牍》	《南窗记谈》	《南窗记谈》
11	《泊宅编》	《南窗记谈》	《过庭录》	《过庭录》
12	《珍席放谈》	《过庭录》	《萍州可谈》	《萍州可谈》
13	《高斋漫录》	《萍州可谈》	《高斋漫录》	《高斋漫录》
14	《默记》	《高斋漫录》	《默记》	《默记》
15	《挥麈前录》	《默记》	《挥麈前录》	《挥麈前录》
16	《玉照新志》	《挥麈前录》	《玉照新志》	《玉照新志》
17	《投辖录》	《玉照新志》	《投辖录》	《投辖录》
18	《张氏可书》	《投辖录》	《张氏可书》	《张氏可书》
19	《闻见前录》	《张氏可书》	《闻见前录》	《闻见前录》
20	《清波杂志》	《闻见前录》	《清波杂志》	《清波杂志》
21	《鸡肋编》	《清波杂志》	《鸡肋编》	《鸡肋编》
22	《闻见后录》	《鸡肋编》	《闻见后录》	《闻见后录》

①这里仍然有个疑问需要提出,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下发的《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论辨〉》中能够明显看出清高宗是看过《辍耕录》提要稿的,但据现有资料,上图稿本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写定进呈的,清高宗何以在正月看到《总目》进呈本,是上图稿本在正月就已经进呈,还是清高宗所见提要稿另有他本,笔者暂未能找到答案,故在此提出,以请方家解疑。

(续表)

序号	上图稿本	上图稿本修订稿	浙本《总目》	殿本《总目》
23	《中吴纪闻》	《闻见后录》	《北窗炙輠》	《北窗炙輠录》
24	《北窗炙輠》	《北窗炙輠录》	《步里客谈》	《步里客谈》
25	《南窗记谈》	《步里客谈》	《桯史》	《桯史》
26	《过庭录》	《桯史》	《独醒杂志》	《独醒杂志》
27	《步里客谈》	《独醒杂志》	《耆旧续闻》	《耆旧续闻》
28	《独醒杂志》	《耆旧续闻》	《四朝闻见录》	《四朝闻见录》
29	《耆旧续闻》	《四朝闻见录》	《癸辛杂识》	《癸辛杂识》
30	《四朝闻见录》	《癸辛杂识》	《随隐漫录》	《随隐漫录》
31	《癸辛杂识》	《随隐漫录》	《东南纪闻》	《东南纪闻》
32	《随隐漫录》	《东南纪闻》	《归潜志》	《归潜志》
33	《归潜志》	《归潜志》	《山房随笔》	《山房随笔》
34	《吴中旧事》	《山房随笔》	《山居新话》	《山居新话》
35	《山房随笔》	《山居新话》	《遂昌杂录》	《遂昌杂录》
36	《山居新话》	《遂昌杂录》	《乐郊私语》	《乐郊私语》
37	《遂昌杂录》	《乐郊私语》	《辍耕录》	《辍耕录》
38	《辍耕录》	《辍耕录》	《水东日记》	《水东日记》
39	《水东日记》	《水东日记》	《菽园杂记》	《菽园杂记》
40	《菽园杂记》	《菽园杂记》	《先进遗风》	《先进遗风》
41	《先进遗风》	《先进遗风》	《觚不觚录》	《觚不觚录》
42	《觚不觚录》	《觚不觚录》	《何氏语林》	《何氏语林》
43	《何氏语林》	《何氏语林》		

由上表可知,纂修官对上图稿本提要顺序做了较大的改动,这一修订被后来刊刻的浙本、殿本《总目》所参考。但纂修官们似乎对于《侯鯖录》《东轩笔录》的分类拿捏不定,殿本将《侯鯖录》提要移至小说家类一末,浙本则是将《东轩笔录》放置在小说家类一末。小说家类共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这一修订体现了纂修官对两部书内容性质的判断。而在上图稿本中,纂修官对提要次序的修订,很明显并不是一个平常的改动。结合档案资料,会发现其背后另有原因。上图稿本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写定进呈,而后清高宗下发两道谕旨,对此稿本提出一些修订意见,其中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谕云:“所

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着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①在这道谕旨中,清高宗着重强调了《总目》提要的编排顺序,他一方面对钦定各书提出了修订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求所录之书,必须以时代为次。但“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乃是历代修书的通例,四库纂修官们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事实上,上图稿本的排序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修订稿相比,大的朝代排序并无错乱,只是每个朝代作品的排序有所不同。这说明上图稿本作为写定初稿,其在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考订上或有疏失,需要进一步修订。这或许是清高宗这道谕旨背后真正的目的。上图稿本修订工作在次年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臣永瑤等谨奏,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告成,并改定《总目》编次、《考证》均经完竣,恭折奏明事”^②。此外,通过上图稿本总目中提要次序的修订,也能够印证刘浦江先生对于此稿本修订时间的考订。

总体上来看,纂修官对上图稿本小说家类提要内容的修订并不多,修订稿基本保留了上图稿本的本来面目。从上图稿本中纂修官的修订来看,凡是经过改动的地方,大都被浙本、殿本《总目》提要所吸收。仅就上图稿本现存的小说提要内容而言,与最终刊刻的浙本、殿本《总目》以及国家图书馆所藏《总目》稿本提要高度吻合。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天津图书馆所藏稿本小说家类的修订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纂修官的这次修订在后来的稿本中并没有再做大幅度的改动,仅对提要的分类、顺序、个别字句等方面进行了微调。

三、上图稿本与现存几种《总目》稿本小说家类提要之间的异同

据笔者所见资料,现存《四库全书总目》的稿本有四种,分别是: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存一百二十三卷)、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存七十九卷)、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存六十三卷)。国家博物馆、辽宁图书馆以及台北“国家图书馆”也分别藏有《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分别存十六卷、一卷、一卷),据学者研究,它们与上图稿本出自同一部书稿^③,故本文将它们与上图稿本算作一种。此外,现存的四库提要分纂稿是四库提要的原始文本,反映了提要编纂的初始情况,与现存的《总目》稿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具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谕内阁所有四库全书各部俱各按撰述人先后依次编纂》(军机处上谕档),第1291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质郡王永瑤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折》(军机处原折),第1602页。

③参见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1991年。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1992年。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第1期,第35-46页。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存的诸种稿本《总目》大多为残稿,保存有小说家类提要的只有上图稿本、国家图书馆稿本、《进呈存目》和分纂稿^①。下面我们就以上图稿本为中心,通过对比国家图书馆稿本、分纂稿以及《进呈存目》中的提要,来对诸稿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做一番初步的探索。

现存分纂稿中的小说类提要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都保存在翁方纲所纂四库提要稿中,其中仅有《投辖录》一篇,同时保存在上图稿本中,我们就以此篇为例。分纂稿《投辖录》提要:

谨按:《投辖录》一卷,宋王明清著。明清字仲言,汝阴人,铨之子。官朝请大夫,博闻多识,尝著《挥麈录》《玉照新志》。是书以“投辖”名,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所记皆奇闻异事,客所乐听,不待投辖而留。”盖客谈之类也。所记皆北宋至南宋初之事。应存其目。^②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清高宗曾就《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下发谕旨:“办理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名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较之《崇文总目》,搜罗既广,体例如详,自应如此办理。”^③这篇《投辖录》提要就是完全按照清高宗的谕旨而撰写的,但提要较为简略,也没有对其内容进行考订。写明“应存其目”,似乎认为此书并非要籍。然而,翁氏所撰提要并未被上图稿本所采纳,内容上与翁氏所撰提要相比差别较大,显然是经过重新撰写,上图稿本提要:

宋王明清撰。明清有《挥麈录》,已著录。是书乃其晚年所作,见于《书录解题》者一卷,与此本相同。其以“投辖”为名者,陈振孙谓所记皆奇闻异事,客所乐听,不待投辖而留也。所列凡四十四事,大都掇拾丛碎,随笔登载,不能及《挥麈录》之援据赅洽,有资考证。然故家文献,所言多信而有征,在小说家中,尤为不失之荒诞者。惟第六条之首,原阙四行,乃传写者所脱佚,今已不可考矣。书中于每条之下,多注所闻之人。今考其江彦文一条,下注闻之陆务观;任苕臣、虹县良家子二条,下

①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存卷一百四十一小说家类二和一百四十二小说家类三两卷。王茜《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一文对此稿本概况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刘浦江先生曾据王文中的比对结果,认为:“浙本和殿本的底本都脱胎于这一稿本,只不过在浙本的底本入藏文澜阁之后,这一稿本仍在继续修改之中,因此惟有乾隆六十年付刊的殿本才能反映《总目》的最终修订结果。”(《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第167页)

②翁方纲等著:《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27-228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閣着四库全书处总裁等将藏书人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并另编〈简明书目〉》(军机处上谕档),第228页。

注闻之僧祖秀。祖秀乃宣和旧人,即作《艮岳记》者,明清犹及见之,而又下见陆游。其称己未岁,金人归我河南地者,为高宗绍兴九年;又称甲戌岁者,乃宁宗嘉定七年。则明清之老寿,可以概见,宜其于轶闻旧事多所谙悉也。^①

这篇经过重写的提要,内容比翁氏所撰更加详实,体例也更为严谨。同时,《挥麈录》一书的价值也获得了认可,所以没有像翁氏建议的那样列入存目。在上图稿本中,此篇提要未加修订,而且与国家图书馆稿本和最终定稿的浙本、殿本《总目》的内容完全一致,看来总纂官对这篇提要是较为满意的。

前面已经提到,据刘浦江先生的考证,《进呈存目》是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已进呈提要的汇编本。此书为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早期编纂史提供了珍贵资料的同时,也对我们研究《总目》小说家类的编纂过程大有裨益。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上图稿本与《进呈存目》之间的差异。

上图稿本中所存小说提要有二十篇也出现在《进呈存目》中,但它们并不全著录在小说家类,这些提要在《进呈存目》中具体分布为:史部杂史类:《四朝闻见录》《程史》《挥麈前录》《默记》。史部地理类:《中吴纪闻》。史部故事类:《闻见前录》。子部杂家类:《北窗炙輠录》《墨客挥犀》《独醒杂志》《耆旧续闻》《闻见后录》《鸡肋编》《清波杂志》《癸辛杂识》。子部小说家类:《西京杂记》《述异记》《酉阳杂俎》《春渚纪闻》《辍耕录》《何氏语林》。这二十篇提要在上图稿本中全部著录在小说家类,但从上图稿本的修订中,我们知道纂修官们对于一些提要的分类是颇感矛盾的。如《中吴纪闻》著录在《进呈存目》的史部地理类,上图稿本将其移至小说家类二,在上图稿本的修订中,纂修官又在这篇提要上做了删除的标记。从浙本、殿本《总目》的著录来看,这篇提要又被调整回史部地理类。与其相反的是,《春渚纪闻》本来在《进呈存目》中的小说家类,上图稿本也采用了这一分类,但在修订时,此篇被删去,调整到杂家类。纂修官对提要分类的调整,实际上反映出小说著录中的困惑,而这种困惑来源于作品的内容和体例,在难分伯仲之时,纂修官也只能取其大要。上图稿本对于提要分类的调整不仅限于大的部类之间,具体到小说家类,则是进一步细化为杂事、异闻、琐语三个类别。当然,在小说家具体的分类上,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从提要的内容来看,《进呈存目》的部分提要基本被上图稿本吸收,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如《闻见前录》《中吴纪闻》《春渚纪闻》等。而在上图稿本修订的提要中,部分经过重写,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兹举《北窗炙輠录》为例,对比如下。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叶十九A、B,二十A。

《进呈存目》作：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执，海昌人，生不婚宦，病废而没。尝与张九成、张璠为友，里人称持正先生。所记多当时前辈盛德之事，有益于立身行己，可为士大夫观法者，盖儒者之言也。中多称道二程，间一及苏氏不甚推重。其第一条即言王氏新法由于激成，其微意可知。惟称林灵素，有活人心，未免好为高论。而解《孟子》“万物皆备”一条，尤近于性恶之旨，不可为训耳。朱彝尊尝得是编于海盐借抄者，始稍稍流播，而《海昌志·人物》莫有举其姓名者，则其湮没，固已久也。^①

上图稿本作：

宋施德操撰，德操有《孟子发题》已著录，是书“炙輶”之名，盖取义淳于髡事。然所记多当时前辈盛德，可为士大夫观法者，实不以滑稽嘲弄为主，未审何以命此名也。德操与张九成友善，故《孟子发题》附刻于《横浦集》末。其学问则九成纯耽悦，德操多称二程，虽间一及苏氏，而不甚郑重。其第一条即言王氏新法由于激成，以阐明程子之意，则宗洛而不宗蜀，其微意固可概见。惟林灵素妖妄蛊惑，实方士中桀黠之雄，而德操称其有活人之心，未免好为异论。又解《孟子》“万物皆备”一条，尤近荀卿性恶之旨。其横浦之学，偶相渐染，故立是异说欤。瑕瑜不掩，分别观之可也。德操病废终身，行事无所表见，志乘至不载其姓名，其书明以来传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于海盐，乃稍稍传抄流播。残编蠹蚀，几佚幸存，亦可云稀觐之秘籍矣。^②

通过比对可知，上图稿本采纳了《进呈存目》提要中的一些信息，对提要进行了重写，而新的提要明显条理井然，体例严谨。因此上图稿本中的这则提要也被后来的国图稿本所采纳，而未作修改。除了部分提要需要重写之外，还有部分提要的修订是基于原稿的。这类修订主要针对两个部分：一是提要的作者、内容，二是提要的体例。下面我们以《鸡肋编》为例，来看一下提要前后的变化：

《进呈存目》作：

宋庄季裕撰。季裕名绰，以字行，清源人。官鄂州府。薛季宣《浪语集》有为绰作《筮法新仪序》，其书今不传，惟此书仅存。是本不分卷数，凡百余条。虽随笔札记，间涉猥琐，征引亦未甚淹博，而亦有足资考证者，犹在《辍耕录》诸书上也。《说郛》所载止十之二三，且多讹错，此编犹为全本。^③

①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68页。

②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叶二十六B，二十七A、B。

③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270页。

上图稿本作：

宋庄季裕撰。季裕名埶，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详，惟吕居仁《轩渠录》记其“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官院子。”又薛季宣《浪语集》有季裕《筮法新仪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据书中年月，始于绍圣，终于绍兴，盖在南北宋之间。又尹孝子一条，自称尝摄襄阳尉，又原州棠树一條，称作倅临泾，李使食糟蟹一条，称官于顺昌，瑞香亭一条，称官于澧州，其为何官，则莫可考矣。此书前有自序，题绍兴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记有绍兴九年事，疑书成之后，又续有所增。世无刊本，陶宗仪《说郛》仅录其二三十条，此本较《说郛》所载，约多五倍。后有至元乙卯仲春月观陈孝先跋曰：“此书庄埶季裕手集也，埶博物洽闻，有《杜集援证》《炙膏肓法》《筮法新仪》行于世，闻其他著述尚多，惜未之见。此书经秋壑点定，取以为《悦生随抄》，而讹谬最多。因为是正如右，然扫之如尘，尚多有疑误”云云。盖犹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祐中，与黄庭坚、苏轼、米芾诸人游，季裕犹及识芾及晁补之，故学问颇有渊源，亦多识轶闻旧事。书中如不知《龙城录》为同时王铎所作，反据以驳《金华图经》之类，间失考证，然可取者多，其记辽宋誓书一条，大旨以和议为主，亦各抒所见。季裕方浮沉郡县，与当时朝士附和秦桧者，固自有殊。统观其书，可与后来周密《齐东野语》相埒，非《辍耕录》诸书所及也。^①

《进呈存目》中的提要考证粗疏，体例随意，还保留着分纂稿的原始状态。然而上图稿本中的提要稿则考证详赡，体例谨严，明确交代了该书的价值和不足。同样，国图稿本沿用了上图稿本的这篇提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两点认识：第一，《进呈存目》与上图稿本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和参考关系。第二，上图稿本对《进呈存目》的修订，大致包括分类、内容、体例三个方面。第三，国图稿本与上图稿本修订稿的文字内容高度吻合。整体来看，国图稿本只是在卷数、题名以及个别词句方面做了少量修改。

四、上图稿本与诸阁本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的关系

如果说现存的《总目》稿本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四库全书》诸阁本书前提要则是另一个系统。现存的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书前提要彼此之间差异很大，其原因颇为复杂。刘浦江先生已经通过《小字录》提要，对《总目》稿本和诸阁本书前提要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笔者则试图在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考察一下上图稿本和诸阁本小说家类提要的关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叶二十三B，二十四A、B。

系,使我们对《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情况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①。

上文我们对比了《辍耕录》提要在上图稿本、上图稿本修订本及《总目》三者中的差异,实际上,《进呈存目》也收录了此书提要稿,先将原文抄录如下:

《辍耕录》三十卷,明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元末教授松江。张士诚据吴,署为军咨,不就。洪武初,举人才不赴,晚岁乃出为教官。是书纪元一代制度及末年战争之事,可参稽史氏。至于考订书画文艺,亦详悉可喜。惜多附俚俗戏谑之语,自秽其书,遂不为后人所重耳。首有至正丙午孙作序,谓其居松江时,有田一廛,作劳之余,时书所见,故名《辍耕录》。丙午者,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始称吴元年,故其称明犹曰“集庆军”,或曰“江南游军”云。^②

这篇提要不见于现存的分纂稿中,我们无法得知其为何人所撰。但将其与上图稿本对比,可以看出这篇提要经过了重新撰写。此后乾隆六十年刊刻的浙本、殿本《总目》也做了同样的处理,而且它们的提要内容与上图稿本修订稿基本一致。在阁本提要方面,文溯阁本提要采纳了上图稿本的修订内容。让人意外的是校对最为严格的文渊阁本和稍后的文津阁本《辍耕录》书前提要并未参考上图稿本的修改,而是直接照抄了上图稿本的原稿。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本《辍耕录》提要分别抄写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四十九年四月和四十七年九月,上图稿本进呈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修订时间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间。如果说文渊阁本提要是因为抄写时间较早,未能看到上图稿本的修订意见的话,那么文津阁本提要则没有这重顾虑,况且抄录于乾隆四十七年的文溯阁本已经参考了上图稿本的修订。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所据底本不同。文渊阁和文津阁本提要都是根据未经修订的上图稿本抄录的,而文溯阁本提要则参考了上图稿本修订稿。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辍耕录》提要的源流,有三个分支:上图稿本→上图稿本修订稿→殿本、浙本;上图稿本→上图稿本修订稿→文溯阁本;上图稿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辍耕录》提要各个文本的源流与刘浦江先生分析的《小字录》源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充分说明四库提要文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事实上,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远不止于此。下面我们再以上文提到的《投辖录》为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投辖录》提要有幸保存在翁方纲的分纂稿中,但在后来进呈的上图稿本中被重新编写。而且上图稿本中的这篇提要未经纂修官修改,与浙本、殿本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辍耕录》《投辖录》书前提要为丁氏补抄,故不宜纳入讨论的范围。

②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307页。

《总目》的提要内容也基本相同^①。这表明,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上图稿本进呈之后,直到乾隆六十年《总目》付梓期间,《投辖录》提要并未经过太多修订。但将上图稿本与诸阁本书前提要相比勘,我们发现,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文渊、文津、文溯阁本提要内容则完全相同。兹将文渊阁本《投辖录》提要抄录如下:

臣等谨按,《投辖录》一卷,宋王明清撰。明清所著有《挥麈前录》《后录》《三录》《余话》及《玉照新志》诸书,已别著录。是书乃其晚年所作,见于《书录解题》者一卷,与此本相同。其以“投辖”为名者,陈振孙谓:“所记皆奇闻异事,客所乐听,不待投辖而留,盖亦客谈之类也。”明清为王铨之子,熟于宋朝典故。其《挥麈》诸录,于朝廷旧事,前哲遗闻,纪录殊为详备。此编所列凡四十四条,大都掇拾丛碎,随笔登载,不能及《挥麈录》之精粹。然故家文献,所言多信而有征,在小说家中,犹为不失之荒诞者。明清《宋史》无传,其年齿始末,诸书多未之及。今按是编江彦文一条下,注闻之陆务观。任苕臣、虹县臣良家子二条下,注闻之僧祖秀。祖秀乃宣和旧人,即作《艮岳记》者,明清犹及见之,而又下见陆游。其称“己未岁,金人归我河南地”者,为高宗绍兴九年,又称甲戌岁者,乃宁宗嘉定七年,则明清之老寿可以概见,宜其于轶闻旧事多所记识矣。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恭校上。^②

与前面所举上图稿本《投辖录》提要相比,这篇提要的内容有着明显差别。而分别抄写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四十九年十一月的文溯阁和文津阁本书前提要与文渊阁本同属于一个系统,或者就是直接照抄文渊阁本。这样,《投辖录》提要分成了两个系统:一是上图稿本系统,最终被浙本、殿本《总目》所吸收。另一个系统是文渊阁本系统,文溯阁和文津阁都从属于这个系统。

在比勘上图稿本与诸阁本提要时,笔者发现稍后抄写的文溯阁和文津阁本提要并不一定是参考了上图稿本和文渊阁本,可能另有底本。如《何氏语林》提要最早出现在《进呈存目》中^③,原文非常简略,分纂官似乎有敷衍了事之嫌:

《何氏语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良俊,字符朗,华亭人。官翰林院孔目。是书仿刘义庆《世说》体例,凡例二千七百餘事。旨尚隽永,尤多名言,注亦搜罗详博,间附己说,考证甚精,非稗官小说可比。^④

①浙本、殿本《总目》中《投辖录》提要,仅删去“明清有《挥麈录》已著录”一句。

②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38册,第681-682页。

③《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亦有《何氏语林》一篇,然仅寥寥数语,几乎没有提要。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3页。

④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307页。

此篇提要我们已无法得知为何人所撰,或许是在进呈之时,纂修官见此提要质量不佳,于是进行了重写,变成我们所看到的上图稿本提要。兹将原文转录如下:

《何氏语林》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斋丛说》,已著录。是编因晋裴启《语林》之名,其义例门目,则全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蓝本,而杂采宋齐以后事迹续之,并义庆原书共得二千七百余条。其简汰颇为精审,其采掇旧文,剪裁镕铸,具有简澹隽雅之致,视伪本李昼《续世说》剽掇《南》《北》二史,冗沓臃肿,徒盈卷帙者,乃转胜之。每条下,又仿刘孝标例,自为之注,亦颇为博瞻。其间摭拾既富,间有抵牾,如王世懋《读史订疑》所谓以王莽时之陈咸为汉成帝时之陈咸者,固未之免。然于诸书舛互,实多订正,如第二十二卷纪元载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证,亦未尝不极确核。虽未能抗驾临川,并驱千古,要其语有根柢,终非明人小说所可比也。^①

上图稿本进呈之后,纂修官并没有对此篇提要作过多的修改,只是将文中“未之”二字,改为“所不”,后来的浙本、殿本《总目》提要均与上图稿本修订稿完全相同,抄录于乾隆四十二年二月的文渊阁本和五十年六月的文澜阁本也都吸收了这篇提要。而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十九年四月的文溯阁和文津阁本提要则没有参照上图稿本系统,且它们的提要内容完全一致。笔者不避繁琐,将文溯阁本提要转录如下:

臣等谨案,《语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良俊字符朗,华亭人,官翰林院孔目。良俊以辩博自负,雅好著述,而所纪时事,每不免附会失实,当时至有“说谎定推何太史”之语。其所著《四友斋丛说》,颇为世所讥。而是编独完善精密,称为详瞻,盖其书名虽袭王诰之旧,而其义例实本于刘义庆之《世说新语》,以词旨隽永为宗,大都摭录旧文,依类编缀。又以其淹贯,旁搜博采,广事搜罗,故所述至二千七百条,曠列眉分,皆可以考遗闻而资谈助。每条下,又多依刘孝标之例,自为之注。其所摭拾,亦悉有条理,至间有诸书舛互而附己说,以折衷之者,如第二十二卷辨元载妻事抵牾之类。其考证殊见确核,尤非小说稗官所可比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②

文溯阁和文津阁本书名均作《语林》,而且其在内容和体例上,都不如文渊阁本那样详赡、谨严。正如前人所说,文溯阁、文津阁的分校官确实不像文渊阁本那样尽心尽责^③。至于他们所据为何本,笔者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暂且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叶四十八A、B,四十九A。

②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2489—2490页。

③参见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第12页。

存疑。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上图稿本与诸阁本书前提要之间复杂的关系显而易见。究其原因,可能与“各阁分校官选择提要底本的随意性有很大关系”^①。小说作为“小道”,难与正经正史相提并论,四库纂修官们在重视程度上自然也有高低之分。在这样的前提下,分校官随意选择底本的行为似乎更加难以避免。

五、上图稿本小说家类的价值意义

正如刘浦江先生所分析的《小字录》提要早期编纂过程那样,小说家类提要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即先是分纂官撰写提要稿,然后经过总纂官的修订,之后将这些修订过的提要稿进行分类编纂,成为了《总目》。在乾隆四十六年《总目》进呈之后,又经过了长达十多年的修订过程,形成了诸多稿本,最终在乾隆六十年才“定本”刊刻。从现存的《总目》稿本来看,我们可以理出小说家类纂修的一个完整过程:分纂稿→《进呈存目》→上图稿本→上图稿本修订稿→天津图书馆稿本→天津图书馆稿本修订稿→国家图书馆稿本→(浙本)国家图书馆稿本修订稿→殿本。天津图书馆的稿本、修订稿,因为散佚我们无法了解其小说家类的修订情况,但通过上图稿本修订稿与浙本、殿本的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乾隆四十七年上图稿本修订进呈之后,直到乾隆六十年浙本、殿本刊刻,在这十多年中,纂修官并没有对《总目》小说家类再进行较大的改动。由此可见,上图稿本修订稿的地位至关重要。其实,上图稿本及其修订稿在整个小说家类提要编纂过程中所起到的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总结了早期的编纂成果,又对后来《总目》的修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其他稿本所不具备的。

前面已经提到,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编纂到六十年刊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纂修官对于小说家类提要的内容、顺序、分类等方面都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尤其是对小说分类的修订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令纂修官们伤脑筋。《总目》提要的最初形态分纂稿是不分类的,乾隆三十九年汇编的《进呈存目》才开始对分纂稿加以分类编纂。《进呈存目》虽然有小说家一类,但与后来的上图稿本相比,并没有具体分成杂事、异闻、琐语三类。这似乎说明在乾隆四十六年上图稿本进呈之前,小说家类并没有具体的分类。此外,在《进呈存目》提要中,没有明确体现出“广见闻”、“资考证”、“益教化”的著录标准和小说观念。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小小说家类编纂尚处于初级阶段,内容和体例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统一。

在《进呈存目》出现之后,上图稿本进呈之前的这段时间,《总目》无疑又

^①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第13页。

经过了纂修官的修订,上图稿本就是对此前编纂、修订成果的一个高度总结。上图稿本不仅将小说家明确分为三类,还将《进呈存目》中史部杂史类和子部杂家类的大量提要放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纂修官在分类上的这一修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说家与杂史、杂家若即若离的关系。恰如杂事类末案语所云:“纪录杂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①这段案语经常被引用,以说明小说与史的渊源关系,但在《总目》中,纂修官却很少提及杂家与小说家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上图稿本小说类对《进呈存目》杂史、杂家类提要的变动,还是上图稿本修订中将《春渚纪闻》又从小说家移到杂家类,都说明与小说家“牵混”的不止于杂史。张舜徽先生在《四库提要叙讲疏》中曾说道:“《汉志》小说家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外,尚有臣寿《周纪》七篇,《百家》百三十九卷。书以周名,犹《易》象之称《周易》,盖取周普、周备之义。《周纪》《周说》,殆即后世丛抄、杂说之类。《百家》一书,尤可望名以知其实,此非抄袭而何?《隋志》小说家自《世说》《辩林》诸书外,复有《杂语》《杂书抄》诸种,其意更显。后世簿录家率以笔记丛抄之书入于此门,实沿《汉》《隋》诸志旧例也。”^②可见,小说与杂家自始既有密切之关系。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曾有过类似的论断,云:“《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③如果我们将《千顷堂书目》和《总目》小说家类进行对比,就会清晰地看到,前者小说家类中大量的作品被四库纂修官调整到杂家类,明清小说观念的嬗变在这一分类的调整上得以充分地展现。四库纂修官对小说家分类的修订恰恰是一种小说观念的流露,而这种观念在最终刊行的《总目》中是无法体现的,我们只能在这些现存的修订稿本中寻找蛛丝马迹。

从《进呈存目》到上图稿本,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体现在提要的体例上。经过修订的上图稿本提要,不但在行文上有了明确判断性的论断,而且还褒贬分明,这自然是相关方面对提要撰写提出的要求。《于文襄公手札》中收录的一封信恰好可以为解读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信中说道:“愚见以为提要宜加核实,其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④正总裁官于敏中的这一建议在后来的上图稿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上图稿本现存小说提要均属应抄之列,提要中“褒贬互见”的写法随处可见。如《南窗记谈》中云:“然所记多名臣言行,及订正典故,颇足以资考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下),第1204页。

②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第280页。

④于敏中:《于文襄公手札》(二),第六叶A。

证。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条,庞籍见天书一条,颇涉语怪。然籍见天书一事,《曲洧旧闻》已载之。盖宋人说部之通例,固无庸深诘者矣。”^①再如《癸辛杂识》说道:“与所作《齐东野语》大致相近,然《野语》兼考证旧文……此则琐事杂言居十之九,体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说家,从其类也。”^②在这些褒贬评判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纂修官眼中的小说“体例”就是指小说内容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考证辨订、军国大事为主的人杂家、杂史类,而内容荒诞不经、繁杂琐碎的退至小说家。关于《总目》的小说观念,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无需本文赘述。笔者想要说明的是,《总目》提要中所反映的小说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纂修官们需要参考的不仅仅是作品的本身,还有体例、政治等诸多方面因素。

总之,上图稿本以及纂修官的修订为我们研究《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和四库小说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诸如纂修官们的修订意见、小说家类的分类排序、撰写体例的变化等等,都是刻本《总目》所无法呈现的。这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将他们与其他《总目》稿本、刻本以及诸阁本前提要相互比对参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四库小说观念从稿本到刻本之间的演变过程。上图稿本小说家类及其修订所展现的不仅是《总目》小说家类的编撰过程,还呈现了《总目》纂修的一个侧面,这无论对古代小说,还是四库学的研究而言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业师谭帆先生的指导,又承蒙外审专家提供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张玄,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古典文献学。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叶二十八B。

②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叶三十五A、B。